



# 体育赛事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

李有强

**摘要:** 在对城市文化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进行了历史回顾,分析了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结构、与上海城市文化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上海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市的战略,探讨体育赛事如何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助推作用。

**关键词:** 体育赛事;上海;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2)02-0039-07

Sports Events and Shanghai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LI You-qia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urban culture, the article make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sports events and urban culture.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events and urban cultural composition and Shanghai urban cultur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Shanghai into a world-renowned sports metropol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enhance the role of sports events in supporting Shanghai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ports events; Shanghai; urban culture

作为体育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体育赛事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体育赛事同城市关系的探讨更是研究的热点。国外已经开始深入探讨体育赛事同城市属性、国民性的关系。然而,在国内研究中,城市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刘清早教授编撰的《体育赛事运作管理》、樊智军主编的《体育赛事的组织与管理》、纪宁主编的《体育赛事的经营与管理》等著作,均侧重于探讨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政治、形象和影响力等多个维度的探讨。缺乏体育赛事同城市文化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尤其缺乏针对上海的个案研究。实际上,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不仅体育赛事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对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影响作用已融入到城市诸多细节中,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特定的城市区域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为该城市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体育赛事是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化事业,是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体育赛事富有改变公众心理的神奇魅力和吸引全球传媒的威力,既可以有效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也可能把一个城市多年的精神财富积累毁于一旦,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往往巨大而深远。系统研究体育赛事同城市文化的关系,不但能够明晰体育赛事的文化属性,探明体育赛事对城市文化的塑造能力,还能够结合上海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市的战略,探讨在上海这样的特定区域,体育赛事如何在城市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助推作用。

## 1 城市文化概念辨析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类文化的

下位概念,因此,要厘清城市文化的内涵,首先要了解“文化”一词的含义。

### 1.1 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概念极为抽象、复杂,据估算,迄今为止至少出现了200多种定义。就连英国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都不禁慨叹道:“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sup>[1]</sup>。大体而言,学术界倾向于用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来梳理众说纷纭的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注重人对自然界对象化改造的过程性理解,着眼于人类超卓于自然界的独特生存方式,经常被称为大文化。因此,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制度、思想都可以成为文化的范畴。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存在,是文化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可摄入“文化”的语义中。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sup>[2]</sup>。这是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界说。

不过,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原本没有对错之分,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经常会灵活选择文化的不同界定:当我们用文化来衡量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我

收稿日期:2012-01-27

基金项目:2011年上海市体育社会科学、决策咨询课题(TYSKYJ2011102)

第一作者简介:李有强,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文化。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8



们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范畴对举时，则倾向于指代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而当我们用文化来衡量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素质、品位高下时，文化则侧重于特定人/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 1.2 城市文化的定义

有关城市文化的概念多数是建立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之上，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出来的。如在汉字文化圈中，台湾学者张丽堂曾在泰勒狭义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界定为“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sup>[3]</sup>。郑卫民则援用广义的文化定义，认为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sup>[4]</sup>。

如同对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理解，城市文化的界定也没有对错之分。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衡量城市的整体文明程度时，城市文化不仅仅是指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人的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还包括人们在这个城市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我们将城市文化区别于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论述时，城市文化主要指城市的精神风貌以及城市物质层面所体现出的文化内容；当我们用城市文化来考察城市居民的素质、品位时，城市文化则主要指城市人口趋同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非常复杂，有学者总结为4点：一是影响领域众多，既对城市社会领域的影响，也有对城市经济、环境等领域的影响；二是影响方式多样，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还有综合性的影响；三是影响时效不一，既有短期就能体现出来的影响，又有在长期才能体现出的影响；四是影响效果不同，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还有正面和负面混合的影响<sup>[5]</sup>。为全面考察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广义的城市文化概念。所谓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体现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指物质的或有形的器物用品，如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环境景观、交通工具等；后者则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艺术、宗教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

## 2 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历史回顾

体育赛事几乎与体育同时产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体育赛事的发展相对缓慢。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随着城市的膨胀、人口的激增，体育赛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后工业时期，体育赛事在城市的发展中，愈加显现出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

### 2.1 工业化、城市化前期的体育赛事

史学界和考古界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人类历史中，“为了平息神的怒气，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象征和现实意义的比赛项目，创造了体能竞赛的独特的组织形式。尽管这些活动具备了体育赛事的雏形，但它们与生存挑战和宗

教信仰是无法分开的。世界上有组织的体育赛事的最初形式可能就产生于这种身体活动和宗教仪式的结合”<sup>[6]</sup>。虽然这些身体活动中包含有竞技比赛的成分，但人们对体育赛事缺乏自觉性的认识，宗教仪式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身体活动的实际意义。第一次文字记载的体育赛事见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伊里亚特》第二十三卷，为纪念死去的同伴，阿奇里斯组织了一场运动竞赛，比赛项目包括双轮马车竞赛、拳击、摔跤、竞走、决斗、铁饼、射箭、标枪。这些比赛包含了现代体育赛事的诸多元素，反映了早期体育赛事的呈现形式。周期性、规模性的体育赛事要追溯到古代奥运会的发展历史。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从公元前776年始，竞技表演以比赛形式出现，因而人们通常把这作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始年代。虽然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曾经举办过293届古代奥运会，但这一时期的体育赛事，一方面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受限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尚不具备将体育赛事镌刻进城市发展细节中的宏观构想，城市对体育赛事也没有表现出孜孜以求的强烈渴求，二者之间缺乏互动。

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前，人类分别经历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但“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物质与精神生活极端贫乏、人类需要为生存而艰苦奋斗的阶段，体育赛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还是微不足道的”，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 2.2 工业化、城市化与体育赛事

工业革命开展后，大规模机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传入农村，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中原本10个人的工作量，现在只要1个人便能完成，另外9个人不得不涌入城市寻找生计。工业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以英国为例，考察城市的发展。格拉斯哥在18世纪末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镇，但靠着拥有60多条汽船和107家纺织厂，这座城市到1831年已发展为2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伯明翰16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小镇，人口也不到500人。工业革命一开始，兴建了铁工业区的伯明翰，却一跃成为英国最大的生产中心。1760年，在伯明翰年总值约60万英镑的铁工业品中，大约就有50万英镑的产品是提供出口之用，1801年人口一下子增至7.4万人，并保持快速的的增长趋势。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伯明翰依靠着自己的钢铁工业，超过了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18世纪初，只有2%的世界人口居住在零散的城市中，到20世纪初，15%的世界人口都可以称为城市居民了<sup>[7]</sup>。实际上，不仅追求资本最大化的工厂主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适时地通过比赛来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聚集在大城市的工人对于体育也产生了一种自发的意识。以英国现代足球为例，早期的足球运动是在城乡结合部开展的校园运动，到了19世纪末期，足球真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工人在业余生活中的休闲运动。可以说足球与城市工人阶级相伴而生，最早的球迷也不是皇室贵族，而是满身油腻的机械工人和肌肉发达、皮肤黝黑的煤矿工。传奇的曼联足球队的前身则是1878年由一群爱好足球的火车车厢制造工人组成的球队<sup>[8]</sup>。虽然当时的上流社会对足球运动颇为不屑，但足球赛事在民众间的发展势头最终让皇室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不得不亲临现场以示认同。



城市对人的异化也引起了以救赎为己任的宗教势力的担忧,他们在考量权衡之后,一改对体育的成见,成为体育赛事的提倡者,以英国“强身派基督教”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教会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城市对体育运动的塑造,使得许多原本不分地域的运动形式,转移到人口更为稠密的城市地区,发展为城市游戏(City Game)。城市化的过程中,各个城市虽然在整体趋势上是相同的,但历史积淀、发展目标和发展进程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竞争。在不能用战争解决城市矛盾的现代社会里,体育赛场成了最好的角斗场。

### 2.3 后工业时期体育赛事的文化解读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欧美等国开展的工业革命运动,使城市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动力。工业革命之前,只有小部分的西方人在城市居住,当时城市的人口大多少于一万人。大部分的城市居民都是商人和工匠。商人以出售工匠的制品谋生,而工匠则多在家中用手工的工具和细小的机器,夜以继日地生产衣服和日用商品来维持生计。体育赛事只能在某些仪式性的活动中偶发出现,缺乏保持常态的时间、空间、人口和技术等因素。工业化给城市带来大量劳动力,加之科学管理、8小时工作时间、女性解放等运动的开展,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第一次面临“如何处理剩余劳动时间”的问题。城市有限的空间中,开拓运动场,组织俱乐部并定期举办体育赛事成为普遍接受的应对策略。可以说现代体育赛事的产生,与城市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欧美城市及其居民渐次异化的过程中,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稍显简单,主要是城市中新涌入的居民在体育赛事中寻求自己在城市里的文化定位。在一个颠覆传统的城市空间中,旧有的生活方式、宗教利益被解构,体育赛事填补了城市新生人口的生活空白。城市人群以工作、来源地、语言等维度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社区,并在各自的区域内组织体育比赛,或者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流,比赛中的球员和观众通过寻找自己的主队和主场来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体育赛事的福音作用,不仅让亲身从事此项运动的人们可以释放抑郁的情绪、增强彼此的了解,即便对那些旁观者来说,体育赛事也能加深他们对自己所处城市和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因此,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体育赛事在城市文化的构建中发挥较大的凝聚作用。

20世纪以来,随着各项体育赛事的规范化程度日渐提高和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的发展,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关联性日趋密切,体育赛事对城市文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已成为赛事组织者仔细考量的重要问题。当然这样的演变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体育赛事概念的演变看出来。体育赛事的概念在经过“运动竞赛或体育竞赛”——“特殊事件”——“体育赛事是一项具有生产性质的经济活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体育赛事内涵价值的不断变化、深入、提升使体育赛事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举办体育赛事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制度资源等的调配,体育赛事的发展更加重视参与主体的体验及价值的实现,更加重视体育赛事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实现”<sup>[9]</sup>。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当我们重新审视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时,体育赛事已经远远超出了竞赛本身,而成为一种能够与城市文化

进行互动的文化现象。

## 3 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结构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考察文化结构,可以将文化区分为技术系统、社会学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所构成,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是首要的、基本的;社会系统,指人类在使用技术系统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由技术系统所决定;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和知识构成,是人类的信念体系,其内容和方向是由前两个系统所决定的,同时,对前两个系统有制约作用。借鉴人类文化的结构模式,按照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怀特的思路,我们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3个层次<sup>[10]</sup>,以此来理解体育赛事对城市文化各结构部分的作用。

### 3.1 体育赛事与城市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均可纳入城市物质文化的范围。它们不仅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往往会给城市直接留下巨大的物质文化遗产。以最近几次奥运会为例。在美国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给举办地亚特兰大留下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奥运村和提供室内体育场的石山公园等。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第27届奥运会,令举办城市悉尼郊区严重污染的废弃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一变而成举办体育文化活动的公共大型场所。在希腊举办的第28届奥运会,同样促进了城市物质文化的繁荣,举办地雅典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兴建了一系列体育设施,包括露天游泳场和海上运动大厦。在中国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更是将无数经典体育建筑留在了中国北京。为了让体育赛事留下的物质文化成为可以传世的典范,赛事场馆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到举办城市的文化底蕴,在新的体育建筑与城市文化的传统中寻找最佳的结合点,由此才能相得益彰。如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举办方将奥运会的赛场建在了古代运动场的遗址之上。田径项目中的男、女铅球比赛是在古奥林匹亚体育场进行的,使人能够重温古代奥运会的神圣和辉煌。而曾举办过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的帕那西奈科体育场经过重新布置,承办了本届赛会射箭和马拉松终点阶段的比赛。曾经作为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自行车赛场的卡莱斯卡基体育场经过翻建后,成为本届男、女足球比赛的场地。这样的安排,让希腊的奥运会的新建场馆能够与雅典的城市文化完美契合。再如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设计中,鸟巢、国家体育馆、“水立方”等奥运场馆将中国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北京城的传统文脉相衔接,成为了北京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奥运会中的会徽、火炬、奖牌、服饰等细节上的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举办地的本土文化特点,为北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体育赛事对城市物质文化的作用,除了表现在与体育赛事直接相关的体育场馆设施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上。大型体育赛事具有短期聚集性的特征,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成功举办体育赛事将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也为城市的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以通过最近几次奥运会的主要支出,来了解体育赛事对城市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东京奥运会的主办者用于组织奥运会的直接开支为0.25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奥运会设施的开支约4.6亿美元,而用于市政建设的费用却高达25亿美元;慕尼黑奥运会的开支中用于组织奥运会的开支为5.27亿马克,而用于建设奥运会设施和市政设施的费用为13.5亿马克;举办汉城奥运会的25亿美元的开支中,有17亿美元是用于修建奥运村,扩建汉城地铁,修建电视中心,扩建公路和清理汉江等<sup>[11]</sup>。北京奥运会投入700亿元人民币实施环境保护,形成蓝天、碧水、绿岸的自然环境。由高速公路网和几十条放射干线组成的北京环路系统、轻轨和地铁线将城市各部分连接起来,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成功申办体育赛事还会吸引来自政府、民间和海外的大量资金投资城市硬件设施的建设和改造,这种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几何效应、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将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sup>[12]</sup>。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服务更新等一系列的投资,都将有效推动城市经济的消费。体育赛事之后主办城市与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差距将明显缩小,与现代化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将显著改善,商务中心区、城市重点功能区、城市危旧房改造和卫星城开发建设都将取得重要成果,城市现代化服务和承载能力将显著增强,交通、通信方面都将得到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都将大幅度提高。

### 3.2 体育赛事与城市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不仅是城市文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后的一种结果,也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实体化的表现形式。人们习惯上用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和城区规模来衡量城市的发展水平,但实际上上述的这些指标都只是城市的外延与现象。实际上,城市作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代表的是生活和生存方式,其根基则在于制度和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的文化水准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体现的规范化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制度是城市的深层内涵和本质。

城市制度文化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城市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能与一种制度相对应。因此,对于城市制度的分类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从宏观层面来说,城市制度可以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从城市居民的需要来看,城市制度可以分为生存制度、安全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从城市管理角度来看,城市制度可以分为工商制度、税收制度、司法制度等。……这里,我们主要采用制度经济学先驱诺思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划分,将城市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大类<sup>[13]</sup>,来探讨体育赛事对城市制度文化的影响。正式制度指的是由某些人或组织自觉或有意识地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如合同、协议。这些正式制度或由权威机构颁布实行,或白纸黑字写在条文里,它的执行由国家权力给予保障,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违反规则就要受到惩罚。非正式制度却不一样,通常指的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也就是说,没有谁强制你一定要如何行事,但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熏陶出了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社会也有无形的压力使你不得不按照社会所认可的方式行事。

体育赛事是一种提供竞赛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特殊事件,其规模和形式受竞赛规则、传统习俗和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项目管理特征、组织文化背景和市场潜力,能够迎合不同参与体分享经历的需求,达到多种目的与目标,对社会和文化、自然和环境、政治和经济、旅游等多个领域发生冲击影响,能够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体育赛事对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也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来说,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能够直接推动城市的制度化建设。大型体育赛事涉及的面特别广,经济、社会和文化无所不包,许多大型国际赛事的申办和组织需要和国际接轨,就必须按照国际的惯例来进行,这对于举办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制度建设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体育赛事本身具有严密的制度和规则,举办城市在参与到赛事的组织过程中,必然会感受到制度化建设所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与体育赛事相关的诸多环节,也需要考虑到规范运行模式,以便更好地应对短期涌入的庞大客流。这些因素,都会对举办城市的制度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赛事的组织运营管理、安全预案、服务保障、风险管理等体育管理制度将促进举办城市的制度完善、发展。如第28届雅典奥运会促进了城市公共交通安全保障的完善,雅典地铁运营公司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安全文化(Security Culture)”意识的培养机制,成为奥运会留给雅典的宝贵的制度文化遗产<sup>[9]</sup>。举办体育赛事将会使举办城市逐步形成完整、成熟的体育赛事制度文化,同时体育赛事将有效锤炼和提升举办城市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水平。

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说,体育赛事能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熏陶出了一种较为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城市文化的建设需要加强正式制度建设,但更需要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首先,因为任何一套正式制度设计都会存在各种漏洞甚至缺陷,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存在问题。其次,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公正是体育运动的灵魂和重要价值尺度,规则是体育运动的生命线。体育不分种族、性别、信仰,摒弃偏见、歧视、欺诈,追寻并实现着公正的核心价值。在体育竞技场上,规则就是法律,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天然契合,都追求平等、崇尚秩序、尊重规则。体育赛事的公平竞争、规则至上可以潜移默化地进入城市居民的行为习惯中。人们在参与体育赛事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要遵守体育赛事的组织程序,赛场中严格的奖惩规则会内化进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作为东道主,举办体育赛事的城市居民,会在一段时期感受到涌入城市中的运动员和国外观众,在应对有形和无形的多元文化的冲击



中,形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文化风范,从而提升城市非制度文化。

### 3.3 体育赛事与城市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一般意义上来说,城市的精神文化是与前面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的,即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但实际上,城市精神文化又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颇难分别,它反映城市物质文化的成果和城市制度的安排。城市的精神文化主要通过城市居民的素质彰显出来,因此,城市居民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便对城市精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决定作用。

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可以让举办城市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从而营造和谐的城市氛围。从直接的经济效益来说,体育赛事的举办可以全方位带动城市经济的增长。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体育赛事可以带来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体育赛事还会让城市居民的素质得以提升。一项针对对2002年曼彻斯特联邦运动会志愿者的调查表明,10 000名志愿者中有50%的人认为自己在运动会期间通过志愿服务获得了新的知识与能力,18%的人认为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们就业的几率更高。46%的人认为作为一名志愿者提升了他们个人的发展<sup>[14]</sup>。城市居民知识和能力的发展,直接带来了整个城市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城市文化的核心所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体育赛事本身所表现的健康向上、和谐竞争、开拓创新等精神文化,对城市精神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作用通过赛事前后的媒体报道加以强化。媒体报道中,往往会回溯该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渊源,在城市传统和体育赛事中有意识地架构起文化衔接。城市文化精神是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发展的根本所在,城市文化精神的培育最终的归宿是城市市民的精神文化的提升。一方面,举办体育赛事的成功经验,在增强城市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更能增强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提升创造了机会,也为赛事举办地展示、挖掘当地文化提供了平台。体育运动表现的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精神文化,是形成健康城市的动力源泉,是现代城市的活力所在、朝气所在。体育运动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蓬勃向上的活力,培养人们勇敢顽强的性格和迎接挑战、不畏艰险的品质<sup>[15]</sup>。大型体育赛事对区域内的传统与价值观念的巩固,对地方市民的自豪感与社区精神的提升等,对于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检视体育赛事与城市精神的关系时,不妨让自己的头脑进行一次以体育为主题的环球之旅。提到篮球,我们想到的是洛杉矶、芝加哥;提到足球,我们想到的是巴塞罗那;提到橄榄球,我们想到的是纽约;提到网球,我们想到的是温布尔登、墨尔本。这些耳熟能详的城市之所以能让全世界的人们铭记和向往,归根结底就是国际化的赛事让城市有了特色,也因此强化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特色的鲜明体现。体育是国际化大都市

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体育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城市的特色,扩大城市的影响,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活名片”。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比喻。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的“外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诸如房屋、街道、交通、公共建筑等物质文化要素;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的“骨架”,它为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证;而城市的精神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体育赛事的举办,则让城市穿上了华丽的新装,令城市的骨架更为强固,同时也让城市的灵魂焕发了更为旺盛的生机,举办城市的人们以一个更为健康、更为积极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 4 体育赛事与上海城市文化环境建设

中国现代体育的引入和发展过程中,上海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许多重要体育项目都首先在上海以赛事的形式被示范和加以推广。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体育赛事不仅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极为重要,同时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建设也极其重要。现代体育的时尚性、新颖性成为增添海派城市文化摩登气息的重要文化元素。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上海被迫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体育赛事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当现代体育,首先是作为西人休闲娱乐方式呈现出来时,体育赛事是最为重要的载体。张群《上海租界略史》中记载:“当开埠之初,居民所恃以为乐者,不过数事,故老相传云,每于夏季夜间,乘羊角小车,沿黄浦滩头,奔走为乐,未及而某社某会,如春笋怒发,接踵而起……”。此后,赛马、划船等比赛项目与上海传统民俗活动相结合,成为城市标志性的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赛事。上海租界时期,赛船运动进入上海民众视线时,其竞赛方式为“赛兵船之小者,旌旗飞扬,戈矛照耀,最足骇悦心神”<sup>[16]</sup>。这样的比赛场面,契合了上海节日民俗中龙舟竞渡的文化,因此一下子便博得了民众的喜爱。西人带到上海的赛马运动纯粹是一种商业经营。1850年,西人在花园巷(今南京路)建立了第一个跑马场。这里举行的赛马是一种空前的商业运作,不同的民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营利:跑马股东通过对赛事的组织赚取巨大的金额,民众通过下注赢钱,而经营马匹和训练马匹的人也能获得相应的营利模式。虽然这种赛马活动在随后的发展中成为一种畸形的赌博活动,但这项活动在上海的发展程度,不但体现了高水准的商业运营模式,还充分地说明了体育赛事对上海城市商业性文化的塑造力。在现代体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上海得风气之先,体育赛事也成为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的重要标签。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诠释了上海“大赛云集”的含义,精品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体育赛事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已成为上海加强国际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上海市体育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国际体育知名城市”的总目标。这就要求上海要充分发展体育赛事,在巩固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形象与地位,进一步推动上海城市文化的建设。上海城市文化的培植和孕育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但要结合城市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更能够从这3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 4.1 上海城市文化地理环境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所在自然地理环境。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入地关系思考的结果。在人类发展蒙昧时期,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人类屈从于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而以极端崇拜的心理来理解地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得了先进的工具,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自然地理的崇拜被对人自身力量的崇拜力量所取代,从而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人类在同自然地理环境的互动中,愈加认识到地理环境可以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但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可以改变地理,为我所用。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与地理环境的发展相联系,甚至其依赖地理环境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形态。体育界目前对景观体育研究的关注,反应了人们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来构建体育文化的诉求。纵观各种体育的自然景观,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绿色体育”、“白色体育”,还是“蓝色体育”,他们都是受地理环境影响甚强的体育景观形态。同时,我们从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产生,也可深深看到地理环境所起的直接作用。

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种族、环境、时代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摒弃其他社会因素而只谈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无疑会陷入“环境决定论”的谬误中,但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为提升上海城市文化水平,承办的体育赛事一方面应该综合考量上海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总结其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地理因素。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上海区域功能规划的过程中,考虑各个区县的地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特色体育赛事,繁荣体育文化事业。比如,在崇明县可以举办体现生态和民俗特点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奉贤、金山等近海地区,可以考虑水上项目的发展。在市区中心地带,可以继续发挥“城市景观体育”的作用,以城市立体背景作为举办赛事的环境。体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系统阐述是以体育视角审视客观自然条件(如山川湖泊、平原旷野)、季节变化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上海市体育科研部门还应该集中优势力量,加大对这个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力度,进一步探讨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体育赛事的关系,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

#### 4.2 上海城市文化经济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体育赛事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功能与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同,体育赛事与经济的关系愈发密切。上海城市文化历史上被总结为海派体育文化,该文化产生离不开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今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尤其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作用。商业性是上海体育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就要求在培植上海城市文化的战略上具备前瞻性的经济视野。步入新世纪后,上海对自身发展的定位做出了调整,提出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需要与之相称的体育,因此,这次调整,也可以看作是上海体育文化发展的一大良机。

从目前上海体育赛事发展及运作模式来看,社会力量参

与体育的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规范体育经济环境必将成为以后体育及体育赛事发展的主要思路。这种转变,不但要求改变“金牌至上”的观念,更要求凸现体育事业的社会力量和民间声音。上海体育文化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同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上海体育赛事等相关产业。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组织的建立、体育产业的发展,尤其要立足于市场的需求。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日渐增强,实践证明,积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不但是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我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体育产业结构中,许多国家注重发展最能体现体育活动本质功能、市场需求最大、与体育产业其他部门关联度最高的体育健身服务业,如健身娱乐、健身技能培训、健身辅导与咨询、体质测试和评估、体育康复和医疗等,从而使体育健身服务业成为体育产业中的主体产业。上海体育文化要成为能够引领风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文化现象,需要一套与之相称的经济环境。以往我们比较重视体育制造业的发展,今后上海应该以引进国际赛事、发展体育赛事所衍生的相关服务业等方式来带动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体育赛事举办的支持力度。

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优化投资结构。体育投资根据其目的和运行法则的不同,可分为政治性投资、知识性投资和娱乐性投资。从总体上说,体育投资结构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适应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体育投资的最佳社会和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投入发展社会体育资金来源的渠道是单一的,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以政府拨款、社会集资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主的社会体育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的格局。今后的发展中,上海市体育职能部门应该大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体育比赛门票、体育赛事场地、体育赛事广告、体育赛事纪念品及其他体育赛事衍生品市场化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来。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体育产业与其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体育产业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产越来越多,体育股票在许多国家二级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高。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大社会资本的投资比例,改善体育赛事所依赖的城市经济环境是上海城市体育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4.3 上海城市文化社会环境

体育文化社会环境是指人类创造出来为体育文化活动提供协作、秩序、目标的组织条件,如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群众的参与及体育传媒的传播,体育赛事的举办要仅仅依托城市政策环境的导向作用。文化社会环境可以在体育赛事和城市文化环境中起到居间协调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赛事对城市文化环境的积极作用。

加强政策引导。体育政策是体育发展的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对体育文化具有宏观导向的作用。区县体育职能部门



应该加强群众体育的法制建设,认真执行现有体育法规,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社会体育督导、群众体育工作、体育社团、场地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逐步完善群众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加强对工人、农民、少数民族、残疾人以及各类学生运动会等的组织和管理。突出群众体育运动会和竞赛活动的群众性、健身性、民族性、趣味性和科学性。充分发挥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行业、系统体育协会和其他群众体育组织,逐步形成社会化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群众体育活动指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所需的各种条件,主要包括体育活动场所(建设及开放体育设施)、体育指导员、体育活动组织(体育俱乐部)、各种体育活动(体育比赛、运动会)等。上海体育文化向来具有自发的民间属性,这也是其生命力的真正所在。如果没有广博的群众基础,上海体育文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体育文化环境的构建中,应该强调对群众体育活动的提倡。各区县体育职能部门应在完善群众体育环境的过程中,选择从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入手。针对社会体育指导者缺乏、场地设施不足、体育活动组织缺少等现象,有的放矢地进行体育指导者的培养、体育设施的建设、体育活动组织的建立,逐步完善群众体育活动所需的社会环境。只有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才能使各个高水平体育赛事的举办具备肥沃的土壤,从而使该项体育赛事在城市中生根、发芽,成为城市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体育传媒的作用。体育传媒可以将体育运动及其精神、信仰、理想、价值加以传播,不但能增强体育文化的影响力,还能推动体育的发展。上海的体育传媒业一直处在全国前列,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体育传媒就有报纸7种,电台、电视台2个,体育期刊7种和出版体育书籍16本”<sup>[17]</sup>。在此后的发展中,无论是体育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还是网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使上海成为我国体育传媒的龙头力量之一。正是这些体育传媒的共同努力,造就了上海体育文化的社会环境,成为上海体育文化继续发挥影响力的“鼓风机”。今后上海举办体育赛事更是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内“三网”融合业已成为传媒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今后体育赛事的举办,新闻人更应该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充足准备,密切关注媒体的发展趋势,发挥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从而将体育赛事的精神导向作用发挥到最大水平。

#### 参考文献:

- [1]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
- [2] 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3] 章友德《城市社会学案例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95
- [4] 郑卫民,等.城市生态规划导论[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 [5] 黄海燕.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J].体育科研,2010(1)
- [6] 刘清早.体育赛事运作管理手册[J].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 [7] Ralph C. Wilcox and David L. Andrews Sport in city: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rtraits
- [8] 颜强.金球:颜强眼中的英超帝国[M].凤凰出版社,2009.
- [9] 武胜奇.体育赛事文化对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提升路径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6)
- [10] [美]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1] 顾小霞,杜秀芳,马俊文.体育赛事的经营与管理[J].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276.
- [12] 李鹏,邹玉玲.体育赛事型塑城市特色[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
- [13]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4] Faber Maunsell.(2004.) Commonwealth Games Benefits Study [M].Final Report Warrington,
- [15]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
- [16] 尹晓峰.上海体育发展的战略环境分析[J].体育科研,2010(1)
- [17] 肖焕禹,李文川,方立.上海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市研究[J].体育科研,2010(2)

(责任编辑:陈建萍)